张荫麟 撰

# 中国史纲

王家范 导读

蓬莱阁丛书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蓬莱阁丛书

**中国史纲**

张荫麟 撰

王家范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　　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56　1/32　印张 8.875　插页 5　字数 186,000

1999年12月第1版　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－8,000

ISBN 7－5325－2674－7

K·297　定价：12.60元

China

# 出 版 说 明

中国传统学术，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，从清末民初起，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。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，融通中西，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，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，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“世纪回眸”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。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，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，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，剔抉其精义要眇，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、历史文化背景，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，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，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。相信这一设计，会比单出原著，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，来得更切近可靠。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，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，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。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，有“汉家石渠阁，老氏蓬莱山”之称，后世遂称藏书阁为“蓬莱阁”，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。

FG12 F5 06

China

# 导　读

王家范

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煞是无情。大江东流不止，潮起潮落，风行的未必就能传承，精粹遭遇冷落亦时或有之。所幸时光似水，反复冲刷筛洗，是沙砾是金子总会逐渐分明。真正的金子，即使因缘种种不幸遭际，被尘土无辜掩埋了，或迟或早都能再见天日。这是事理所使然，强制不得的。陈寅恪、吕思勉、钱穆、蒋廷黻等等不都是如此?!

这里，将要向大家推荐的是张荫麟教授(1905—1942)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：《中国史纲》，也属于数十年后重新发光的一个事例。

## 为学贵自辟，莫依门户侧

《中国史纲》，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《中国史纲》的第一部。1935 年，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

有余，任清华大学历史、哲学两系教授。受部聘后，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他科研课题，“遍咨通人”，潜心策划《史纲》体例和细目。还特别向清华请了长假，专致笔耕其所负责的先秦至唐以前部分。其余部分原计划邀请吴晗、千家驹、王芸生等分任。

未及二年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突发，国难当头，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浙大、西南联大，其事遂不如愿。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，将此前已完稿的八章，加写《自序》，遂由他执教的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，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贵州遵义面世。原初题名《中国史纲》第一辑（此据张其昀《张荫麟先生的史学》，笔者尚未见原本），时为 1941 年春夏之间。初次印行匆促，著者名还曾被误植为杨荫麟，荫麟也不在意。又据《初版自序》、《再版自序》，知次年再版，始增入九至十一章（前据吴晗《记张荫麟》，后一点吴文回忆则有误）。此后，先生兴趣转移，改攻两宋史，但仅撰写三章（第三章未完），就因病撒手西归，年仅 37 岁。如天假以年，从其已发表的宋史成果预测，《中国史纲》的宋史卷必将更为光彩夺目——一想到至今尚没有一部能与张氏风格相匹敌的两宋史，他的英年早逝怎不叫人伤感倍至?!

读过《中国史纲》的，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，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，举重若轻，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，后也罕见（唯钱穆《国史大纲》可相匹敌）。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，不故作深奥高奇，史事都以“说故事”的方式从容道来，如行云流水，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。也因为读来悠然轻松，据我个人的观察，读者很容易轻忽了对著者构思和寓意的细心体察；一不经意，书中潜心涵泳所得的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精警见地，屡屡就从眼皮下滑过。为此，我想先从著者的人格、学术风貌说起，或许对读者进一步体会本书不无帮助。

离荫麟去世才四、五年，谢幼伟博士著文怀念故友，就不无忧虑地说："这一位天才学者，俗人不必说，即学术界中也许已忘记了他。他的著作以报章杂志发表的短文为多。这些短文到现在还没有集合出版，整部的著作仅有《中国史纲》，而这也只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的石印本。所以在某一时期内，他虽曾惊动我国的学术界，到目前他却很可能为学术界所遗忘。但他是最不应遗忘的一人。"此后，情况虽然还没有到谢氏杞忧的那么糟，文集、《史纲》海峡两岸还都出版或重印过，但流传不广。世俗总多势利和健忘，也是无可如何的。

张荫麟的名字，对今日大多数学人恐怕都会感到陌生。然而，恰如谢氏所说，回溯到三、四十年代，荫麟名声不小，曾被学界誉为奇才，受到了前辈和同龄学者的普遍敬重。1929年夏与荫麟同船赴美留学的谢幼伟博士，更是热情赞美荫麟为天才，在长篇的纪念文章里说道："张君是天才，这是无疑问的。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，曾写过一篇《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》，寄到《学衡》杂志，《学衡》的编者认为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作品。这一点即可证明张君的聪颖是远在一班学人之上的。所以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先生遇到了这一位年轻学生，也不能不特别注意，不特别赏识。"(《张荫麟先生言行录》)

荫麟来自广东东莞，自幼丧母，家境贫寒。1923年秋季考入清华学堂(时为留美预备学校)中等科三年级，直至1929年大学毕业，经历了清华学校改制的全过程。入学伊始，即如上述所记，不足18岁的荫麟，已经著文向老师梁启超挑战"老子出生"说，且考辨精细，征引经典凿凿有据，名惊京华。在继

China

后的两年里，他在《清华学报》、《学衡》、《东方杂志》等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不下十余篇，涉及经学考据、中外交流史、科技史等多项领域，还参与了当时正轰动学界的(顾颉刚)“古史辨”论战。今天，重读这些论文，我们简直不敢相信，一个20来岁的学生，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。其中《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》不仅大大扩充和修正了乃师(启超)关于这个论题的史料，而且对西学输入的影响以及清代并未因此而改变“科学(思想)不盛”的原因发表了精辟见解；《张衡别传》和《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》两文，则更应该看作首开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风气的力作，具里程碑意义(刘仙洲先生即如是说)。据不完全的统计，去美留学前的六、七年时间内，已积有学术成果(包括译文)40项。怪不得谢幼伟博士终发为“天才”的赞叹。

蒨麟自号“素痴”，常用作文章笔名。我以为，无论从哪方面看，例如对学术的痴情专注，孤傲内向，不通人情世故，不易适存于现社会(友人谢幼伟、张其昀、贺麟、吴晗等回忆他的个性)，以及治学“神解卓特，胸怀冲旷”(熊十力赞其学术境界)，也包括过早地夭折，难享永寿等等，蒨麟都很符合天才学者的特征。然而，如若只从个人天赋角度去理解，那很容易忽略了蒨麟先生的许多更有价值的启示。

近代以来，人才成群，风涌而起，明显有过两个突出的高峰时期：一是晚清咸、同年间，以曾、胡、李、左、张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幕僚文士为代表。是时人才济济，不拘一格，政坛文气之盛为中古以来所未有。其中能集道德、事功于一身如曾、胡者虽凤毛麟角，但在经世致用一隅有卓识奇功，建树不凡的可以数出一大群。稍后在他们的影响下，还走出了一批

China

最早通达世势、熟悉"洋务"的新人。二是本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具现代意义的各种学科相继滥觞,"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",一代沟通中西的学科权威名家大抵成形于这一时期。假如说上一高峰"事功"派占尽风光,许多人物多似电闪雷鸣般倏然过眼,有力度而少余韵;那么第二个高峰承上辈及其时代的恩泽,别开新天地。是时激荡过后,"朝野"尚称"苟安",中西文化教育往来更密。淡出"事功"的"学问"派那厢真现独好风景,其山高水长,遗泽后世且深且厚,更堪百年后回味不已。

荫麟生而有幸,亲逢学问盛世的文化滋润,并能以新秀的身份参与其间。他天性聪颖,造化把他从岭南送上京华,进入风云际会的文化中心,后来又留学西洋,确是时势造就了他天才有为。那时,"五四"个性解放、自由探索的新风吹拂神州,学术报刊似破土春笋涌出,自由讨论风气极盛一时。荫麟又直接生活在梁启超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胡适、陈寅恪、吴宓、傅斯年、钱穆、顾颉刚(其中最年轻的,也比荫麟长十几岁,均属老师辈)等等一群知名学者辉映的人文光环下,犹鱼得水,遨游自如,才有了上面"少年英发"动人的一幕。

读荫麟的传记,最令我感动甚至妒忌的,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学术自由讨论的文化氛围。同在清华,哲学家贺麟比荫麟高三级,两人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。据贺麟的回忆,荫麟给他的第一印象是: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天天在图书馆钻研的青年。一天晚上,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,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,向听众中问哪一位是张荫麟。荫麟当即起立致敬。原来是荫麟写信去质问老师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,梁先生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。这事发生在荫麟已于《学衡》著文与先生商榷之后。他俩常去听梁任公的演讲,

China

可见对先生的仰慕。但荫麟的脾气向不愿意拜访人(终生不改,时人称其为"怪")。1926 年夏,被贺麟拖着才第一次拜谒梁任公。先生异常欢喜,勉励有加,当面称赞荫麟"有作学者的资格"(另据王焕镛《张君荫麟传》,说"梁任公得其文叹曰:此天才也"。参见本书附录)。此后二三年中,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。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,也终于没有去请(见贺麟《我所认识的荫麟》,载《思想与时代》第 20 期,1943 年 3 月)。还值得补一笔的是,1929 年初,荫麟正在撰写长篇学术论文《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》,针对梁先生燕京大学演讲《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》而发。论文在《燕京学报》刊出时,梁任公已病逝。荫麟在文末特别有一段附语,说"此文初属草时,梁先生尚在世。本当重校付印,先生已下世,竟无从请问以决所疑矣。作者极不愿意于此时举其素所尊敬之学者之旨为错误之例。惟以爱真理故无法避免耳。"

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学生,气度、风范尽在不言中,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骄傲。荫麟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,不独对梁任公。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则,对其他师辈如周树人、陈寅恪,年长而刚负盛名如顾颉刚、冯友兰,他的评论也总是"是则是,非则非,毫不掩饰,毫不客气",而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,师长更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,至少也不会像现在那样,弄不好就扯到别的地方去。不信,可以去读寅恪先生诗:《挽张荫麟二首》(载《陈寅恪诗集》第 31 页)!

荫麟一生信奉恪守的治学格言,是"为学贵自辟,莫依门户侧"(《致贺麟留美赠别诗》)。荫麟在他光采而短暂的一生中,这种个性气质实在是太强烈了,因此也特别地感人。诵读他的学术论著(也包括教材的编写),我们处处都能触摸到那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种不甘因循蹈袭，勇于求新求突破的自由创造精神。这再一次证明，寅恪先生所说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“思想不自由，毋宁死耳”，决非义宁一人所独执，而曾经是沐浴了“五四”精神那代人的真诚追求。那时，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的话很流行，没有任何权威偶像是碰不得，不可说不的。这样的氛围不可复得。唯其如此，优秀学者于“五四”后一二十年内成群成队地喷涌而出，才可以被通解、被体认。

这种不依门户、自由创造的风格，决非世俗常见的那种无端狂妄，藉浅薄挑战名家以求一搏。荫麟从心底里尊敬一切有学术成就的前辈和师友，细微地体察汲取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创造，治学厚实而见地敏锐，执著底定而鄙薄趋俗。据说他最崇拜的是章太炎，对梁任公表面上“敬而远之”，再而三地“挑战”，内心实则一往情深。熟悉他的朋友说，荫麟最钦佩任公文章“笔锋带有情感”，“张君的文章颇受任公的影响，一篇之中总含有多少任公的笔调”。

那时，刚从经学考据的桎梏中叛离不久，国学的根子依然深扎在一代新学的底部，欲连根铲除（也毕竟铲不尽）那是几十年后的事。荫麟的学术是以考据起家的，很见功力。对太炎先生服膺至深，即是明证。有人统计，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都涉及考辨，学问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。然而，荫麟可贵的是，承传而不因循，勇开风气敢为先。荫麟曾对谢幼伟坦言：“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”，言之似极轻松。反之，为了《中国史纲》，他却喟叹：“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。”一轻一重，其味无穷。

在阐明这轻重内涵之前，我先得把荫麟对任公的纪念文章拿出来，一则彰扬他对老师真诚而不带一丝虚假的爱（这是

China

最有价值的尊师),一则为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一份证据。据现在掌握的材料,梁任公刚去世,"全国报章杂志,纪念追悼他的文章,寂然无闻"。荫麟在甫将赴美前夕,即草写了《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》一文,首次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,将老师一生智力活动划分为四期,分别评估他在各时期的"特殊贡献与影响",客观公允,敬仰之情含而不露(载《学衡》第 67 期。贺麟所述赴美后一文,已是第二篇,记忆有误,不赞)。十多年后,他所参编的《思想与时代》特地刊登了张其昀录存的任公未刊遗札中数十事为《梁任公别录》,荫麟亲为之跋。文章起首即声情并茂:

> 此时为此文,不禁起予空谷足音之感也。方戊戌前后,任公之在文界,何啻如旭日中升?一篇之出,百数十万人争诵。曾不四十年,后生已罕或能举其名。其一知半解者,甚且为蚍蜉之撼。"或荣誉若天仙光宠,消逝时迅越流星",歌德之诗,可为任公赋矣。

接着大段论述任公与政的种种曲折,反驳攻击者,并检讨自己十年前"年稚无知,于(先生)民国后之政治生涯,妄加贬抑",评析平恕允直,可与寅恪先生《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对读,此处略过。笔锋转至学术,荫麟说道:

> 以言学术,世人于任公,毁誉参半。任公于学,所造最深者唯史。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。以为其考据之作,非稗贩东人,则错误百出,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。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,全不在考据。任公才大工疏,事繁鹜博,最不宜于考据。晚事考据者,徇风气之累也。虽然,考据史学也。非史学之难,而史才实难。任公在"新汉学"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,若《春秋战国载记》,若

China

《欧洲战役史论》，元气磅礴，锐思驰骤，奔砖走石，飞眉舞色，使人一展复不能自休者。置之世界史学之林，以质而不以量言，若吉朋、麦可莱、格林、威尔斯辈，皆瞠乎其后矣。（《跋梁任公别录》）

此跋的文风，酷肖乃师，磅礴之势不减。活泼泼的荫麟就是这样：对自己素所尊重的老师，他不讳言其短，“才大工疏，事繁鹜博，最不宜于考据”，寥寥几笔，可谓弹无虚发，正中鹄的。而于先生史才、史识之长尤三致其意，领悟深得精髓，亦属“就有道而正焉”。我作教师的有经验，百依百顺的，尽说好话的，未必就是最好的学生。还是贺麟说得极有余味：“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，后来会成为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。”梁任公是个大忙人，晚年转而治史已时不待我。荫麟靠着他对前辈史才、史识的独具慧眼，《中国史纲》的创制获得了非凡成功，而这便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。

从上文即可读得荫麟的心声。他绝对不是故意看轻考据。考据是很苦的事，是一种特别的工夫，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。然而，不以考据为底止，注重推出义理，这才是荫麟治学的个性特色。而且，这义理也是经过改造，充实了新的内涵的。他的治学理路，在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写给张其昀的信中说得最明白：“国史为弟志业，年来治哲学社会学，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。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。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。”（海峡两岸《文集》均有载录）所以，他对谢幼伟说的一易一难，决非故作危词，内中大有深义存焉。这实际关联着一个时代大话题，就是：考据与义理的关系。

China

我以为谢幼伟的确算得上是荫麟的钟子期了。荫麟选择对谢氏发此骇俗之论，亦可谓“择其善鸣者而鸣之”。荫麟死后五年，谢氏在纪念荫麟的文章中作了如下的发挥：“写通史是需要思想，需要有很高的识解的。有人认为专门弄考据的人是思想上的懒惰者，这虽不见得完全正确，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，则至低限度，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。考据必进至义理，必以义理开拓其心胸，然后使考据不落空。一位良好的历史学者不能光是一位考据家。不管他的考据做得怎样好，然只是史料的提供，不是史学的完成。史学的完成，有待于史学家理解的深入和同情的洞察。这一点又须待史学家具有史学的修养。治史学的而不兼治哲学，这是一种缺陷。”(《张荫麟先生言行录》)

荫麟在新史家群雄纷起的那个年代，能够独树一帜，特具风骨，确实应该归诸他不满足现状，不随众亦步亦趋。众史家中，他是最先觉悟到史学的改造创新，应该借助哲学革新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，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变迁，以滋补旧史学义理的“营养不足”。可以这样说，在史家中，对西洋哲学和西方社会学了解的广度和深度，当时无人可与之伦比，独居翘楚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从《“可能性是什么”》、《论同一》等文来看，世纪初西方一些哲学新潮已进入他的视野，如柏格森、罗素、怀特海、斯宾格勒；特别是现象学刚兴起，荫麟就注意到了，这在中西哲学交流史上也值得记一笔。

当时，编著中国通史蔚然成风，因为学识才华的特殊，学者普遍对荫麟都期望很高。钱穆在 1942 年底，把他的《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》一文作为对荫麟的悼念，发

China

表在《思想与时代》杂志上。文末即说:"故友张君荫麟,始相识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。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。当谓张君天才英发,年力方富,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,学既博洽,而复关怀时事,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。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,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。岂期天不假年,溘然长逝。"史家偏好经验事实,一般很少像荫麟那样深陷于哲学沉思。因此,熊十力耐不住破门而出,说道今之言哲学者,或忽视史学;业史者,或诋哲学以玄虚,二者皆病。特赞张荫麟先生,史学家也,亦哲学家也。其为学规模宏远,不守一家言,使天假之年,纵其所至,则其融哲史两方面,而特辟一境地,恢前业而开方来,非荫麟莫属(《哲学与史学——悼张荫麟先生》,1943 年)。

荫麟天性聪颖,但他从不自恃天赋而学点偷懒。束书不观,空谈义理,天才成为无知浅薄的狂汉,荫麟是不愿为之的。荫麟治学的勤奋几乎近于癫狂。每写一篇文章,精神高度集中,老是几晚不睡觉,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时,然后才大睡几天,大吃几顿。寓所里满地满床的书,东一本,西一本,凌乱狼藉得不成样子,他也无所谓。到病重的时候,他开玩笑地对友人说:"我从今后要学懒了。"可他还是做不到,劝他改读点轻松的小说,改不了习惯,依然捧起哲学书,手不释卷,直至临终。因为读的书极多极广,著文不论古今中西,随处触发,总见火花。他的时评也写得极犀利明快,有时惹得当局十分恼怒。在史学、国学、哲学、社会学四方面所积功底,使他可以和当时任何一门专家对话。然而,通博并不是他的真正骄傲。荫麟对社会、对历史那种全局统揽和深刻洞察的独特把握能力,在当时才是出类拔萃,最具价值的。

China

在我看来，荫麟《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》、《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》两文，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史学理论认识的制高点。有些观点后来不仅未有超越，甚至有所倒退。关于这个话题，将留在下一段落再作讨论。最后，还想特别要说说他的一篇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短文：《玩"易"》。1956 年台湾版《文集》就因疏忽（或别的什么原故？）而漏收，实在不应该。因为，这代表着他关于社会进步一种独特的历史思考。

这篇短文写定于 1933 年 9 月。从文内"异国晚秋"字句推测，写作的时候人还在美国。荫麟借发挥《易经》的哲理，实际谈的主题是社会变迁和"革命"。这么一个很深奥的社会哲学问题，他却几乎是用了散文诗的形式来表述，很含蓄，也很深沉。短文直指《易经》的着眼处在生命，故曰："生生之谓易。"而近世流行的"革命"一词又恰好是从《易经》"革卦"里推演出来的。与时潮最不同的是，文内反复申述，要把"易"应用到"革命"上，要懂得革命是新生，要懂得"生"是不能急催的，不能揠苗的。社会秩序原是活的，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。所以革命的"命"要当生命解。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。不然，革命只等于寻死。他极为感慨地说道："创造新的生命，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，那岂是病夫易室，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事，而急促得来的？"用不着我多加饶舌，熟悉百年来思潮变迁的学人，都能掂出这些话的千钧分量。这才是真正经得起百年历史检验的义理。我要补一句的，这里反映出了荫麟对孔德、斯宾塞以来的社会学基本学理的圆熟运用，而且妙在不着痕迹，极似寅恪先生的风格。所以他对历史的考察，往往侧重社会层面，在制度的创设和功能演化方面，非常用力，颇多新的洞见。这种史识后来被应用到对历史

China

上农民起义和改革、改制的全新诠释上，极其成功，如《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(一失败之均产运动)》、《南宋亡国史补》和《中国史纲》第十一章《改制与"革命"》。行内人读了多能体会这些文篇在史学史上的特殊价值，但一般读者则未必。尤其是前两篇，形似考辨之作，更不合现在读者的口味。除专门理论探讨文章外，荫麟的史学论述风格，是从不脱空搬弄理论概念，横插大段议论，义理即寓于史事铺叙之中，偶有一二句点睛之笔，亦淡淡而出，极容易被放过。或许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，所谓《春秋》笔法。读者宜多加咀嚼，细细消化才是。

## 众窍无穷　天然自成

编著新式通史肇始于本世纪之初。1900 年，章太炎先生发表《中国通史例略》，首先发起设计新通史的动议。梁任公随即响应，于 1901—1902 年开始酝酿写《中国通史》，但始终未能履践心志(荫麟对此最感痛惜)，留有一些关于通史新体例的设想和春秋、战国《载记》、《年表》等片段尝试。最早真正付诸实践并开创章节体"通史"的，要数夏曾佑及其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(写于 1902—1904)。进入到三四十年代，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止荫麟《中国史纲》出版时，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种(此依《七十六年史学书目》统计所得)。

然而，到了 1945 年，顾颉刚先生编著《当代中国史学》时，却秉笔直书道："中国通史的写作，到今日为止，出版的书虽然不少，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……故所有的通史，多属千篇一律，彼此抄袭"，"编著中国通史的人，最易犯的毛病，是条

列史实,缺乏见解;其书无异为变相的《纲鉴辑录》或《纲鉴易知录》,极为枯燥。"顾先生的这些评点,对今日大多数教材还基本适用,最多增加了变相的《通典》,算是人事物俱备,实在是难为情。

当时顾先生认为较理想的通史,点名有吕思勉《白话本国史》、《(吕著)中国通史》,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,陈恭禄《中国史》,缪凤林《中国通史纲要》,张荫麟《中国史纲》,钱穆《国史大纲》,共六人、七部。应该说,这一点评大体公允。荫麟的书虽未完成,顾氏为之惋惜,但仍给予刮目相看,亦见得《中国史纲》的价值。

荫麟刚刚经历颠沛流离,生活甫定之后,1940 年 2 月在昆明为《史纲》写下了篇幅不短的《自序》。文气与正文迥然不同,读起来不轻松。一般读者在读完全书后,再去啃《自序》比较合适。《自序》,与其说是荫麟对《史纲》调度构思和剪裁史实标准的一个交代,毋宁说它更像是将《史纲》升华到历史哲学的高度,为理解整个人类史(不独是中国史)提供一种经他梳理过的理路。历史专业的学生若能将荫麟的理路与他的实践对照着反复品味,会加深体会熊十力所说的,"融哲史两方面",境界就不一样。

我想首先要提到的,是荫麟在《自序》里说:"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。"这话夹在大段理论阐发之中,很容易滑过。然而,这确确实实是个中人的肺腑之言。教了许多年中国通史,不能不常与教科书打交道。我有时也隐约觉得,通史好编,也最难编。所以,读到荫麟这句话,特别感到震动。

记得严耕望先生说过,中国通史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,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,与断代史有别,与专史也有别。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